



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文学担当*

李德辉

摘要:六朝尽管国家分裂,但洛阳到建康仍有一条驿路沟通南北,驿路走向、沿途风物、风俗人情均对六朝文学的文体、题材、主题产生了影响。永嘉南渡后,该驿路应时势的变化,变成乱世士人的奔亡之路,文官从征奉使之路,奉使交聘行记、从征行记、交聘语录、从征唱和诗、轶事小说从中而出。不仅如此,还对传统的行旅文学有明显的推动,这一时期产生的诗文,主要写此路的避难、奉使、征伐、交聘,带有鲜明的乱世特征。题材虽非新增,但内容和风格有新变。这些诗文创作提高了六朝行旅文学的水平,使得汉魏以前还默默无闻、尚未独立成类的行旅诗,成为士人熟悉的常用题材。这表明贯通南北的驿路交通是六朝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洛阳;建康;驿路;六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1-0101-08

古代文学发展固然有其内生动力,但有时也有赖于外力推动,六朝文学就是如此。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双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对文学影响较大,许多作品围绕这些事件展开。交聘和征伐就是如此,不少诗歌、散文、辞赋、行记、语录,都以其为记录对象。这几类作品本来就因交通而起,对其成因、内涵和艺术表现的阐释,自然离不开交通这个角度。六朝之交聘和征伐,主要通过连接南北国都的洛阳到建康驿路进行,因而从这条路入手,不失为有新意的途径。过去对这条路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地理上,本文则从驿路的独特性入手,这是新意所在。

一、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独特性

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该驿路地位特殊,是六朝南北交通的主干道。六朝虽然朝代更迭,路线众多,但全

国性道路却只有东、中、西三线。东线即洛阳至建康驿路,途经丹阳、广陵、淮阴、宿豫、武州、徐州、陈留、荥阳等地,承担着交聘、征伐、出使的重任。战争年代是避难迁徙的要道,和平年代则是官员调动、文士求名的要路。西线从关陇通往江陵,中线从洛阳通往荆南,连通的都不是京城,虽也有征伐交聘出使,但次数少,对六朝文学影响有限。东线在大陆东部,连通的是南北中国的主体部分,又介于南北国都之间,其行旅不仅最密集,也最重要。

第二,六朝时洛阳至建康全程置驿,接待官客,是当时交通条件最好的驿路。该驿路连通南北国都,交通类型主要为政治军事,凭借着种种优势地位,能打破乱世阻隔,维持长期的南北联系。全程长达二千余里^①,“计人行程五旬”^{[1]1639},交通功能强大,通往地域更广,又有前代旧路做基础。其他道路都更远,或是水路,或多山险,不便行旅,所以秦汉以来不曾置驿,难以进入文学范围。

收稿日期:2023-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文馆文献汇编”(21AZD134)。

作者简介:李德辉,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湖南湘潭 411201),主要从事汉唐文学研究。

永嘉南渡后,随着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这条路成为乱世第一要路。二百余年文人官客北上南下,首选此路。跟治世相比,乱世交通最大的不同是无法维持一般的人员来往,只有出使能打破乱世阻碍。战争结束,和谈一起,使命必通。故而交聘不受时局影响,贯穿六朝。从曹魏到隋初,三百多年都有遣使交聘。交聘使节代表国家颜面,为此而遴选门第、相貌、文学才能均一流的人物充任。这些人出身文士,有创作才能,借交聘之机撰写行记,创作诗歌,开展文学活动。

这条路上还有一类交通是征伐。南北双方国力转强的时候都有吞灭对方、一统江山的意愿,因而屡屡兴兵征讨。北朝南征和南朝北伐,各有六七次。这些军事行动用人较多,文人则以军府僚佐身份参加,沿途还临机办事,大量诗文由此而出。

第三,该驿路景观风物、故事传闻独特。沿途秦汉以来的战争遗迹,睹之令人触目惊心。汉魏晋帝王将相、名臣贤德事迹碑刻,多在路边,十分醒目。先秦汉魏故事传闻,从尧冢、舜帝耕田处、老子宫,到马超、韩遂遗迹,最后到梁陈江表遗迹,囊括的古迹传闻之多,超过任何一路。其中核心一段是下邳、彭城到洛阳段。这一线是汉代帝王巡守封禅之路,还是刘项争雄之路、三国群雄逐鹿之路。丰县、沛县一带,刘邦、张良、范增、曹植等大批名人留下遗迹。这在地理志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翻阅《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可以看到,古迹、名胜最密集的恰恰是关中到江左一线。此二书都以搜罗宏富著称,特别是《太平寰宇记》,所记半数以上为唐前史地,古迹名胜最密集的是周秦汉魏历代建都之区及交通沿线,其中古迹、人物多在六朝行记、文章、诗歌中出现过,表明二者的密切关联。正是这些独特的史地因素,促使交通地理在适合的时候,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文人笔下,从而对六朝文学文体、题材、审美旨趣等产生影响。

第四,这条路还有其他道路所没有的历史事件。这条驿路在中原的路段,处在南北中国的中轴线上,长安、洛阳、开封、许都均在其中,还通达晋阳、邺都,因而很多重大历史、文学大事都发生在此驿路。历史上,这条路是始皇东

游之路、汉帝巡守之路、三国群雄征战之路。文学上,则是曹大家随父东征之路、潘岳西征之路、蔡邕和顾荣避难入吴之路、二陆入洛之路、张翰还吴之路、陶侃入京之路。不仅如此,它还是六朝军事交通第一要路,主要征战均发生于此。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褚裒北伐、永和八年(352年)殷浩北伐,都经泗口、彭城。晋末刘裕北伐,经京口、广陵到彭城,再西进。其中碭碭到徐州是关键一段,南北征战,必经此地。刘宋檀道济、到彦之北伐,均军败于此。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王玄谟北伐,路线为广陵—泗州—下邳—彭城—碭碭—滑台—弘农—关城。这年冬拓跋焘南侵,亦循此道出彭城,至萧城,抵瓜步,跟六朝南北交聘路线重合。六朝南北交聘路线,据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②和逯耀东《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③,自南向北,依次为建康—琅琊—瓜步—广陵—淮阴—宿豫—下邳—徐州—薛城—兖城—无盐—东阿—碭碭—滑台—邺城。自北向南,则是邺都—洛阳—碭碭—彭城—下邳—广陵—京口—建业,这是主线,至徐州折而西行。另一线从洛阳到淮南、寿春,主要用于征伐,文人较少经过。南宋张虞卿云:“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2]即指明了中古南北交通东、西二线。横江、采石路即洛阳至建康驿路,而寿阳、历阳路则在河南、安徽境内,乃另一路。为了加强沟通,这一线的道路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是“使命日夕往来”^{[3]1602},和平年代更是使命岁通。

南北交通第一要路的特殊地位保证了此路与文人的密切关联,驿路景观、山川胜迹、古迹传闻、历史事件的丰富多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这些条件保证了此路必然能对六朝文学有较大贡献。

二、促进六朝文学新文体、题材、风格的增变

文学发展有时也有赖于外部环境,国力盛衰形势治乱,都能影响到文学。朝代更迭还会导致都城迁移和城市布局调整、交通网络改变,而这又会引发文人流向改变。汉末魏晋正好处

在这样的关键点上。由于朝代更迭和持续战乱,从东汉末到东晋初,国家的城市布局、交通网络都发生改变,文人创作的空间条件也有改变,文学生态已不同于时局安稳、国家统一的汉代。洛阳到建康的驿路在乱世仍能维持正常交通,这条路之所以能影响六朝文学,都城位置、路线走向起到了决定作用。洛阳和建康都在大陆中东部,又介于南北国都之间,所以永嘉南渡后成为交聘之路;而战端一起,又变成进军之路。南朝都城建康在江东,由此路北上,即进入山东。反之,北朝南伐,江东也是主要方向。早在八王之乱时,这条路就变得很重要。到南朝,则成为第一要路。到晋末宋初交聘征伐加密之际,国家分裂已近百年,造成了南北方难以消除的隔阂,当有机会进入对方境内,立即产生一种异域的新鲜感,引发出强烈的书写愿望,大量的诗文由此而产生。

这条路对六朝文学最显著的改变,是文体样式、题材类别的新增和作品风格的新变。

文体和题材方面,因此路而兴的第一类样式是从征行记。学界公认最早的行记是《法显传》,原名《佛国记》,成书年代是义熙十年(414年)。其后由他人改写的《法显传》,则成于义熙十二年(416年)。但刘裕北伐西征,也在义熙五年(409年)至十三年(417年),其中写北伐慕容超南燕的三书,作年在义熙五至六年,比《法显传》更早,所以也就不能说是受了《法显传》影响,而应视为独立写作,当是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编撰的,是一种原发性的创作行为。《法显传》是义熙时写成的,《述征记》等从征行记也是义熙中写作的,有各自的书写对象和空间。故可认定,这条路上的交通行为,是催生古行记的重要机缘。从征行记即起于此路。尽管非纪行之正体,却是六朝行记的大宗,是随笔记录的笔记体,无论文体样式还是题材内容都为周秦汉魏文学所无,是一种新增和变异。

从征行记可考的有二十多部。其中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晋末刘裕北伐西征,产生了近十种行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梁武帝普通年间及陈初北伐,产生的著作有《普通北伐记》等军事纪行著作。二者相较,刘裕北伐的影响更大,行记作者就有戴祚、郭缘生、孟奥、伍缉之、

徐齐民、裴松之等人,都是刘裕军府僚佐,写义熙中随刘裕北伐慕容超、西征姚泓经见。当时可能是奉诏写作,所以写作时间、作品体式、行文风格都一致。郭缘生、戴祚、裴松之从征记,属晋末纪行专书,是作年早且文体初成的首批发行记,此前虽也有类似作品但文体未成,这批作品是这条驿路对六朝文学在文体、题材、内容上的独特贡献,且是多人创作的系列作品,显示出其对文学的促进作用。它之所以能影响六朝文学,是借助特殊生成机制实现的。以政治需要为推动,交通路线为基础,文人为主体,交通在明处,军事外交在暗处,二者交互作用,通过文人构撰,新的题材类别和著述体式由此而出。

第二类新作品是交聘行记,始于宋、齐与北魏“使命岁通”的元徽、永明之际,梁武帝时进入高峰,时代更晚。《南齐书·魏虏传》:“宋明帝末年,始与虏和好。元徽、昇明之世,虏使岁通。”^[4]《梁书·范缜传》:“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5]揭示了这类行记的生成机缘是休战讲和,遣使交聘,洛阳至建康驿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交通途径。南朝都城建康在大陆东侧,从洛阳出发南下建康,最便近的就是此路,便利的交通条件成就了这批作品。此类作品的作者有北齐李绘、封君义,东魏陆操、尉瑾,南齐王融、刘绘,梁萧子显、姚僧垣,陈姚察、姚最、刘师知、江德藻等人,作品从李绘《李谐行记》起到姚察《西聘道里记》,有十余部。考虑到三百多年间多数年份使命岁通,实际所作当是今日所知的数倍。其行记不重行程,而重见闻,用的是山川风土的笔记体。《册府元龟》卷一四二《帝王部·和好》总序叙交聘缘起曰:“自建安以来,三国鼎分……及夫天将悔祸,民思息肩,繇是冠盖相望,玉帛修聘。咸筑待宾之馆,相高专对之能。”^[6]准确概括了此类作品的兴盛背景,记载六朝交聘130次。自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遣使聘魏起,到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369年间,除去西晋短期统一,外加因战争而中止交往的数十年,其余时间都有使事。只是史书多有缺略^④,且所载行文简洁,很多使事都只有事名,未载事主,其实多为有才华、门望的文人。

这样,交聘一事,就和文学联结,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奉使交聘、从征行记虽内容各异,但为了保持记载的真实性,有意略去个人身份、事件经历、旅程日期,而只按空间顺序,选择性记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社会面貌、种种奇异事象。这种对材料的独特处理方式,构成其写法的一个新特点。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古行记在六朝的新风格,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这种新风格的突出特征,是地理述异。地理述异是六朝史地书的普遍特点。由于多部行记都有这个特点,故而足以构成六朝行记的新风格。郭缘生《述征记》《续述征记》就是典型,今存二书佚文多达二百余条,在唐前记体类行记中存文最丰富,写法也有代表性。里面所记,无异于晋宋间江左到中原道路历史传闻、民间传说的汇总。这一时期的交聘记也同样如此,陈江德藻《聘北道里记》记载了吴县邵伯埭北鹿筋驿,梁代设置于此的“逻”(边防哨所),有孝女过此,一夜为蚊蚋所食惟存筋骸的骇异传闻。还有北方婚礼以青庐迎娶新妇的奇异风俗。《魏聘使行记》《封君义行记》《李谐行记》则记洛阳至建康多个驿站、鳖洲等江东地理景观、北方不同于南朝的习俗,等等。各条文字,都以行程为线索,选择数种地理景观记述,呈“古迹方位+地理特征+当地传说”的结构。这种风格不是访古,而是述异,不仅内容有文学性,写法也带有文士想象夸张,不乏文学意味。

第三类新作品是交聘语录,与交聘行记伴生,但是别为一体,以奏启文体写作,内容是接待对方交聘使节的重要对话,交给有关部门编纂国史。唐宋以后散佚,今人缺乏了解,有如下17种,分别是:《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华阳国志》《金楼子》所载秦宓与吴国来使张温在成都的殿廷对话,多达数百字,内容完整,出自秦宓奉使语辞。张畅《接虏使语辞》,最早的南朝文士接伴北使语录,原文主体见《宋书·张畅传》^⑤,北齐时为魏收所看见,采入《魏书·李孝伯传》。《魏书》卷六二《李彪列传》载魏使李彪和梁主客郎刘绘接对,四百余字,改编自李彪出使语辞。《魏书·李安世传》载有北朝主客郎李安世与齐使刘缵永明二年(484年)在魏都邺下的谈话。

《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载,永明中,南齐张融接对北使李道固,当出张融出使语辞。《梁书》卷二六《萧琛传》载,永明九年(491年),南齐萧琛接待使北魏李道固,出萧琛接对虏使语辞。《南史·王弘传附僧达孙融传》载其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四百余字,节选自王融《接虏使语辞》。《魏书》卷六五《李平列传附子谐传》载,李谐聘梁,萧衍遣主客郎范胥对接,为语录体,改编自李谐出使语辞。《魏书·儒林传·李业兴传》《北史·李崇传附奖弟谐传》载,李谐天平四年(537年)秋,与卢元明、李业兴聘梁。梁武帝使散骑常侍朱异对接,双方言语往复多个回合,多达九百余字,当出自李谐、李业兴使梁语辞。《梁书·王份传附孙锡传》载,梁武帝普通初,中书舍人朱异等接待北魏使刘善明,引文二百余字,出梁代交聘语录。《太平广记》卷二九六引《北史》载北齐卢元明聘梁事,出其聘梁行记。《北齐书·李浑传》载,北齐李浑聘使至梁,受到梁武帝称赞,其弟绘武定初,又为聘梁使主,为语录文字。《陈书·徐陵传》载其太清二年(548年)出使北魏之殿廷对话,徐陵出使语录,修入史传。《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卷三、卷七、卷一一、卷一二载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八年(542年)、十一年(545年)三次使事,引及魏李同轨、陆操,李騫、崔劼、魏肇师,梁陆緬、徐君房等三种出使语录^⑥。《隋书·潘徽传》载,潘徽在陈国,接待隋使魏澹,三百余字,改编自潘徽接对隋使语辞。

上述统计,均出南北使臣出使“语辞”,记作者迎送、伴随、对接对方交聘使节的经过,因为是以记载重要对话为主,故按照古人观念,称语辞,宋代改称语录。原是一种外交官出使奏呈皇帝的汇报公文,表启体裁。本六朝文章之一体,交聘语录而以表启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它跟一般的表启和语录异样,加上行文也多载南北口语、逸闻掌故,读之可见世态人情,不无文采。《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每梁使至邺……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觐之。一言制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胡注:“两国通使,各务夸矜,以见所长,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犹可以服觐国者之心。”^[7]“一言制胜”四字道出了其中奥妙。在对问中战胜对方,能为本国争光,必在语录中重点记载。《北史·李纬传》载,李纬以

长于词辩,为主客郎,前后接对凡十八人,颇为称职,邺下为之语曰:“学则浑、绘、纬,口则绘、纬、浑。”^[8]这是成功的典型。反之,若是交接失言,必遭惩罚。《南史·徐陵传》载,太清二年魏收使梁,和徐陵对接,就因失言辱国,回国后齐文襄帝囚之累日,像这样的事也会载入语录。但书中并不是只载出使言语,单纯的言语也不足以成体,其组织材料用的还是出使行记的叙事方式,开头、中间、结尾有对行程、背景的交代。这些文字作为行文线索,将不同场合的语录串联,组成出使语辞。

但出使语辞只是根据文献内容给出的称谓,本身并非独立文体。整理成文时还是须遵惯例,采取表启文体,故而这类文献,名为语辞,实乃奏启。宋代出使辽夏金元语录,即题为奏呈语录,这套做法就是源于南北朝。南北朝出使语录,就是事毕必须奏呈的,这是当时制度规定。概括地说,语录体行记是奏启为文体,语录为语体,是一种以奏启文体写成的语录。回国后,作为机密文件上呈有司,未能广泛流传,外人不知。能够看到的,只有正史、杂史、笔记中的出使对话,从行文的连续性、内容的完整性及措辞口气看,并非一般史传语言,而是别有来历,改编自使臣提交的出使报告,而在史传中没其名氏,删去首尾,使之融入正文,而不至过于异样。这样的书,本质上是一种语录体行记,在行记的叙事框架中载语录,以语录为文体,纪行为线索。载于《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总集类的《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就是一部这样的交聘语录文献汇编,所用文体即启奏,该书是这三组交聘对象交接对话的文献汇编,经隋代秘书学士整理才成书^⑦。这样的书从内容看,是史事的叙述,更近史体。体裁则是应用类文体,可当实用文章看。出于着眼点的不同,两《唐志》编入杂史类,《隋志》视为总集类,各取其性质之一面。《史通·书志》:“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9]提到古本《宋书·五行志》也载有南北使臣出使语录,刘氏以为,将这种东西也编入正史,是编次失当,毫无必要。但这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史书史料采择“多载词章,少载事实”^[10],

“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11]的新特点。因为交聘语录带有故事性、斗争性,充满机辩和智慧,故而以语录入史,实即以轶事小说入史,这么做虽然不无芜词,有损史书之简洁,但也增强了作品的新奇感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丰富史料,增广见闻,未可尽以为非^⑧。

第四类是从征唱和诗,内容呈纪行与唱和相结合的特点,纪行是写作背景,唱和是创作方式,句意也是纪行与唱和的复合,这使得这类诗跟以往任何作品都不同。刘裕、萧衍北伐途中,就举行过数次大型诗文唱和,唱和诗由此出现新类型。其中东晋末刘裕北征南燕途中在徐州的诗歌唱和,参与者多达百余,人数甚至超过唐代宫廷唱和,为中古文学史上一大奇迹。唱和场所就在徐州彭城县东南二里戏马台^⑨。刘裕晋末起事,以彭城为基地,在此受封宋公,建立宋台。因而他征齐途中,在此停留,召集文武贤才,唱和宴会。由此,在晋末徐州,兴起唱和宴会文学。由于唱和之日正值重阳,又以戏马台登高览胜为内容,结合了节日民俗书写,因而在诗题和内容上有独特性,为晋宋之交文学一大亮点。萧绎《金楼子》载:“帝(高祖)始游军彭城,置酒,命纸笔,赋诗曰:‘先荡临淄寇,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才并作也。”^[12]表明刘裕是此次唱和的发起者,从臣都是奉诏而作。《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徐州彭城县:“宋武北征至彭城,遣长史王虞等立第舍于项羽戏马台……重九日,公引宾佐登此台,会将佐百僚赋诗以观志。作者百余人,独谢灵运诗最工。”^[13]《宋书·王昙首传》:“从府公修复洛阳园陵……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3]1678}表明诗写的虽是徐州,背景却在征途。谢灵运此诗,早在梁武帝时即被认为名作,萧统将其选入《文选》,唐初编入《艺文类聚》,题为《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同题作还有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卷二八宋刘义恭《彭城戏马台集诗》。另一次著名的文学活动见《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从平关、洛。“宋台初建……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3]1532}可见这样的唱和还不止一次。

行记、语录、从征唱和诗较之以抒情为特征的文学,是支流、亚种和变体,而记体类行记和交聘语录又是行记和语录的变种,是特殊中的特殊,其孕育滋长需要一定条件。不生于其他路而成于此路,那就只能说明此路在交通、文学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从交通出发,不仅可找到这些文学样式生长的缘由,还可揭示其特点、价值。故而对于此类式样,又不可以工拙论之,而当着眼于其创体立体之功。

从时代看,这些作品与永嘉之乱有关。永嘉之乱将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半,造成长期对立的世局,对立之外还有通好,两种状态都产生交通行为和文学创作,多在此路进行。受写作目的影响,多数作品还采取了异于传统的体式和文风,永嘉之乱对文学的影响,在这条驿路上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穿越乱世的文学生产之路。

三、推动六朝行旅文学的发展

这条路在六朝承担着连通南北的重任,交聘、征伐、出使、避难、征辟、赴任均发生于此,都是政治上的大事,很多文人都曾参与,故而还能对传统的行旅文学起到促进作用,而这又有三种表现形态。

第一种是时局安稳时的交通行为,产生一批名士赴洛诗文。魏晋都城在洛阳,从洛阳东出南下乃是行旅的主要取向,所以当五言诗高涨之际,以五言为体的行旅诗就率先在此路涌现,且质量较高,特色鲜明。据《晋书》,太康中,陆机、陆云、张翰等吴中俊才,相继入洛。纪瞻太安中,弃官归家,后朝廷召拜尚书郎,与顾荣一同赴洛。晋怀帝时,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杜夷为方正,二人一同赴洛。这些交通行为都产生了一些佳作。纪行诗方面,名作有陆机《赴洛诗二首》《赴洛道中作二首》,后者《文选》卷二六《行旅上》李善注以为误载,云实为赴太子洗马任,非纪行,但细看其诗,两首都有多处纪行文字,表明四首均为自吴赴洛的纪行诗,且时代较早,在作者类型和作品风格上也有代表性,分量并不轻。又陆机《尸乡亭诗》:“东游观巩洛,逍遥丘墓间。秋草蔓长柯,寒木入云烟。发轸

有夙宴,息驾无愚贤。”^{[1]485}与《赴洛道中作》属同类,为其居洛期间某次离京东游所作,与《文选》所载陆机赴洛诗并非作于同一次。仅有六句,文意未完,颇疑编入类书时经过删节。据《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汉高祖遣韩信破齐,征田横入京,田横行至此处,拔剑自刎。但诗中并未咏田横事,而写深秋驿边枯寂景色,所述之景触目伤怀,从中可见乱世暗影。诗题中亭乃驿的古称,因是以驿馆为视点的,故可视为现存文献中最早的馆驿诗。名气虽不及《赴洛道中作》大,但成就也高,前人就很重视。《文镜秘府论》将此诗和王粲“灞岸”、潘岳“悼亡”、徐幹“室思”相提并论,以为“并有巧思,互称奇作”^[14]。近人王闳运认为,此诗描绘驿边荒寂景色,如在眼前^{[15]905}。这些前贤评语,都恰到好处地指出了此诗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纪行文的创作同样是从这条路开始的。时代较早的有陆机《行思赋》,元康四年(294年)作^{[15]102-103}。其次有王文度《吊范增文》,作于升平五年(361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途中,咏楚汉之交刘邦、项羽争天下事。升平为晋穆帝年号,也是局势安稳的时候。虽仅为节录,但文辞之美,显而易见。作品复合了纪行和访古两方面的内容,带有感伤格调,显得很特别,虽篇幅简短,却代表了行旅文学的新形态。

第二种是易代之际的短期统一,也产生纪行诗文。晋惠帝元康四年,陆机以太子洗马补吴王郎中令,出洛东行,返回故乡,途中作《行思赋》,这是晋代较早的纪行赋,对其行程有完整的记述,感情沉郁,为抒情小赋之佳作。义熙七年(411年)东晋破灭后秦。十三年又灭南燕,国家出现短期统一,这时又产生遣使入洛诗。最初的作品是颜延之《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作于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之际,文辞藻丽,当时就为名士谢晦、傅亮所激赏,此后被编入《文选》卷二七《行旅下》,和陶渊明、谢灵运、谢朓行旅诗同类。清代学者何焯赞其格调清壮,以为“在颜集中亦为清拔”^[16]。又谢瞻、郑鲜之五言纪行诗《行经张子房庙》,亦义熙中从刘裕西征所作。谢灵运《撰征赋》^[17],写义熙十二年出使刘裕彭城军前。全文按照征行路线,从建康一路向北,写到徐州。作者将纪行与写景、抒情和议论很

好地结合,包蕴深广,概括性强,成就不亚于其另一名篇《山居赋》,《宋书·谢灵运传》全文载录。文中提到从石头城到淮泗、徐州千余里路途的数十处古迹,“途经九守,路逾千里……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3]¹⁷⁴⁴,可见这条路古迹众多、山川壮伟的特点,这本身就是有利于怀古咏史诗文创作的。

第三种是乱世军兴或遣使交聘的纪行、送别、宴会诗文,作品有宋范泰《经汉高庙诗》、梁庾肩吾《汉高庙诗》,写徐州彭城县汉高祖庙。庾肩吾《经陈思王墓》、陈昭《聘齐经孟尝君墓》、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所写陈思王墓在郢州,孟尝君墓在徐州滕县,留侯墓在徐州沛县,均奉使道途所经。庾肩吾《经陈思王墓》“雁与云俱阵,沙将蓬共惊。枯叶落古社,寒鸦归孤城。陇水哀葭曲,渔阳惨鼓声”^[18]三联,还以状物传神著称,明陆时雍将其采入六朝诗选本《古诗镜》,以为语极俊挺,胜过鲍照“孤蓬坐振”及王勃“落霞孤鹜”,可见造语构境的怡然自得之处。

此外又有一批写晋宋名人轶事的笔记体小说,是与此驿路有关的乱世事象,有十多条,单《世说新语》就有六条。《赏誉》载,王敦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事。《贤媛》载,陶侃家贫。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明旦去。至洛阳,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同样知名的,有《世说新语·任诞》载张翰随贺循入洛事^[19],《识鉴》载张翰弃官还吴事,《言语》载吴郡人蔡洪举秀才赴洛事,亦均出晋宋轶事小说,而被采入《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作《刘氏小说》,卷二四五引作《启颜录》,盖史料前后相承,而没其出处。又梁代任昉《述异记》,叙陆机骏犬黄耳,自洛阳为其传家信到吴事,文中所述黄犬之忠诚黠慧、动作神态,体现出鲜明的六朝志怪特征,故事极为有名,唐初载入《晋书》卷五四《陆机传》。《艺文类聚》卷七一引王隐《晋书》载,朝廷征顾荣为侍中,入洛后,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祸。又《晋书·戴若思传》载广陵人戴若思,遇陆机赴洛,为其感化,遂与定交,所述之事有独立性,当出南朝小说。

还有一类诗写南北聘使路途经见或交聘活动,虽未专注于纪行,但也与行迈相关,写作地

点都在驿路沿线,或京城的都亭驿、聘使馆。阴铿《广陵岸送北使诗》,即作者在广陵江岸某驿送别某位北朝使节,为六朝送别诗之名篇。王褒《始发宿亭诗》写出使北齐,始发建康都亭驿,夜宿驿馆。庾信《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入彭城馆》《聘齐秋晚馆中丞酒》《反命河朔始入武州》,写梁末出使东魏,四首诗有两首作于北齐驿馆,写驿边景色,抒情意味并不浓厚,少数诗写驿馆夜景,更有特点。考虑到此类诗的专门性,《艺文类聚》于卷五三《治政部下·锡命》特设“奉使”一门,收北齐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诗》等五首。《文苑英华》卷二九六设《行迈八·奉使》,收吴均《奉使庐陵》、庾肩吾《奉使北徐州参丞御》、何胥《被使出关》、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裴讷之《奉使至邺馆(公宴)》、庾信《将命至邺》《对宴齐使》《将命至邺酬祖正员》、阴铿《广陵岸送北使》、潘徽《赠北使》、卢思道《赠司马幼之南聘》等十一首,除吴均之诗写国内奉使外,其余均交聘外国诗文,内容新颖,又都成于此路,是六朝行旅文学的重要成就。

上述诗文多作于西晋以后,主要写此路的避难、奉使、征伐、交聘,带有鲜明的乱世特征。尽管题材非新增,但内容和风格有新变,与一般的行旅诗文有别,从而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其创作提高了六朝行旅文学的水平,使得汉魏以前还默默无闻、尚未独立成类的行旅诗,成为士人熟悉的常用题材。看似纷乱的纪行诗文,其实却是以洛阳至建康驿路为中心的旅行书写,读者只要以此为中心,联系作者生平及时代,就能深入理解作品。《文选》诗歌部分行旅类率先将其编录,《文苑英华》继承之,等于在文学上对征伐、奉使、交聘类作品做了肯定。《文选》成书之前,虽有行旅诗赋,但并无行旅文学之名。到萧统编撰《文选》,才提出行旅一词,并将其视为文学类别加以标举,收诗三十五首,所收还仅限于陆机这样的名士诗,远不及《文苑英华》全面,从《文苑英华》亦可知此类诗文之分量。

注释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载,唐润州到洛阳1810里,但六朝此路是陆路,经过山东,更迂曲,故里程当在2000里以上。②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③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259页。④《魏书》卷四九《李系传》：“侍中李神儒举系为尚书南主客郎，系前后接对凡十八人。”卷五五《刘骛传》：“于时与萧衍和通，骛前后受敕，接对其使十六人。”卷六二《李彪传》：“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谿谿。”《隋书》卷七二《陆彦师传》：“彦师所接对者，前后六辈。”仅此四人，接对南使就如此之多，但正史所书，未及其半，可见漏略之多。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0、1228、1390页。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62页。⑤沈约《宋书》卷四六《张邵传》、卷五九《张畅传》，长达3600余字，对研究南北朝语录体行记体例、内容颇有价值，参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96—1400、1598—1606页。⑥史睿：《南北朝交聘记的基础研究——以〈西阳杂俎〉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⑦李德辉：《语录体行记的形成历程及学术价值》，《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⑧于涌：《北朝文学之形成与南北文学互动》，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2—109页。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页。

参考文献

- [1]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964.
[3]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986.
[5]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664—665.
[6] 王钦若, 等.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725.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4879.
[8]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208.
[9] 刘知几. 史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47—48.
[10] 赵翼. 陔余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27.
[11] 赵翼. 廿二史札记校证[M]. 王树民,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26.
[12] 萧绎. 金楼子校笺[M]. 许逸民, 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97.
[13]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98.
[14] 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校笺: 南卷集论[M]. 卢盛江, 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457.
[15] 陆机. 陆机集校笺[M]. 杨明,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6] 何焯. 义门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18.
[17] 谢灵运. 谢灵运集[M]. 李运富, 校注.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170.
[18] 李昉, 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1566.
[19] 刘义庆. 世说新语校笺[M]. 徐震堃, 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97.

Literature Assume of Postroad from Luoyang to Jiankang in Six Dynasties

Li Dehui

Abstract: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though divided into north and south, there was a postroad from Luoyang to Jiankang communicate north and south. The trend, scenery,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postroad, all exerted influence to the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genres, material and theme. After the reign of Yongjia, adapted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this postroad became the road of refuge and escapement for scholar-officials in troubled times. Record of civil service go to the front and be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ravel notes of diplomacy, expedition analecta, military changhe poetry, anecdote novel all can be found in this road. Not only that, but also the traditional travel literature has obvious promotion. The poems and prose generated in this period mainly wrote about the refuge, envoy, conquest and engagement of this roa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rbulent times. Although the theme was not new, there were new changes in content and style. The creation of the travel literature improved the level of the Six dynasties, making the travel poems that were unknown before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nd had not yet become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become familiar common themes of the literati. This shows that the post road across the north and south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 Luoyang; Jiankang; postroad;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责任编辑/随 斋]